

敘事中的天花：將疾病控制寫入冷戰歷史*

EREZ MANELA

蘇聯衛生部副部長維克多 M·日丹諾夫博士（Viktor M. Zhdanov）于 1958 年 5 月抵達明尼蘇達的明尼阿波利斯，參加世界衛生組織（WHO）召開的年度最高決策會議——世界衛生大會（WHA）。¹此行意義非比尋常。這是自蘇聯總理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出臺與西方“和平共處”的新政策以來，蘇聯代表團第一次參與國際衛生組織召開的大會。²不僅如此，日丹諾夫在大會上一鳴驚人，號召國際衛生組織在全球範圍內發動一次消滅天花的行動，以期徹底根除這種古老而致命的疾病。鑒於大會的舉辦地點，日丹諾夫一開始就引用了美國總統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寫於一百五十多年前的致天花疫苗發現者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的信。傑弗遜在這封 1806 年的信中，向詹納保證，這一發現將使得“未來各個國家只有從歷史中，才知道天花這種可怕的頑疾曾存在過。”³

如今看來，這位蒙蒂塞洛的聖人還是言之過早。雖然在詹納發明疫苗後數十年間，疫苗已被廣泛使用，然而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天花仍未被根除。日丹諾夫提出倡議之時，天花在南半球依舊肆虐橫行。就在 1959 年，日丹諾夫此行的次年，世界衛生組織正式設立了 SEP 項目（按：根除天花項目，Smallpox Eradication Program 的縮寫）。然而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重心並不在天花項目上。由於備受矚目的、美國支持下的瘧疾計劃才是當時的工作重心，許多年來天花項目一直缺乏經費與人手。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葉，美國扶持的根除瘧疾計劃未達到全球滅絕的目標，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事實。⁴隨著越戰升級，美國在發展中

* 我要感謝 David Armitage, Matthew Connelly, Niall Ferguson, Julia Irwin, John R. McNeill, 以及其他未署名的評論者。他們有益的評論推動了這篇文章的寫作。

¹ 這一會議通常在世界衛生組織總部日內瓦的萬國宮召開。它受明尼蘇達州議員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一位國際主義者）之邀在明尼阿波利斯召開。時恰逢世界衛生組織十周年紀念日，彰顯了美國對該組織的支持。

² 此時世界衛生組織成立僅十年。蘇聯和其他蘇聯集團的國家早在 1948 年就已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為該組織未向東歐國家提供充足資源表示抗議。對此世界衛生組織認為，他們的退出並未被組織核心接受，一直以來這些國家都還被視為組織的成員國。見 Javed Siddiqi, *World Health and World Politics: The World Health Origination and the UN System* (London, 1995), 104-09

³ “Future nations will know by history only that the loathsome small-pox has existed.”見傑弗遜給詹納的信，1806 年 5 月 14 日，The Thomas Jefferson Papers, Series 1, General Correspondenc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在世界衛生大會的備忘錄上，引的即該內容，只是可能從英文翻譯到俄文，再由日丹諾夫由英文表達出來，句子不很優美：“in the future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will learn about this disgusting smallpox disease only from ancient traditions.”見 “Eradication of Smallpox: Robert Submit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一篇，存於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World Health Origination, No.87(1958):508 (後來的 ORWHO), 也見 F.Fenner, D.A.Henderson, I. Arita, Z.Jezek, 以及 I.D.Ladnyi, *Smallpox and Its Eradication*(Geneva, 1988),366-68 (後來的 SAIE)

⁴ 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對瘧疾計劃的起起伏伏有非常詳實的敘述，見 “The Mosquito Killer”, *The New Yorker*, July 2, 2001, 42-51. Randall M. Packard 有更批判性

國家的形象不斷滑落，力圖促進國際合作、提升本國在第三世界形象的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政府終於決定支持 SEP 項目。呼應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62 年作出的人類終將登上月球的誓言，約翰遜總統于 1965 年 5 月宣佈，美國將在未來十年內致力於消滅天花。⁵

1967 年，世界衛生組織終於配備了資金和足夠的人力，開始“集中”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這時世界範圍內，每年有約兩百萬人死於天花。⁶ 此後的十年間，SEP 項目付諸實施，在三大洲幾十個國家展開行動，地區範圍從巴西穿越非洲哈拉沙漠西部、印度次大陸，一直延伸至印度尼西亞群島，以拱形輻射了整個南半球。這一計劃不僅需要技術、科學和組織層面的管理，還需要在各層面上協調隨之而來的政治文化衝突。這類協調，涉及在日內瓦國際論壇上的政治駕馭，同眾多與會國簽訂“國家協議”的外交努力，也涉及同一系列當地人——從尼日利亞北部的豪薩艾米爾（Hausa emirs）、到印度北方邦的鄉民們——協商疫苗接種的問題。由美國提供大部份經費，蘇聯承擔疫苗供應，最終天花於 1977 年在全球範圍得到徹底根除，並於 1980 年獲得國際衛生組織的官方承認。它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消滅的重要傳染疾病，並為後來所有根除疾病的計劃——包括 HIV/AIDS、肺結核以及小兒麻痺癩——提供了先例。⁷

單就二十世紀而論，天花約使三億人丟掉了性命。這一數字是二十世紀所有戰爭死亡人數總和的兩倍以上。因而，根除天花很可能算得上是戰後最重要的行動之一。⁸ 鑒於天花在南半球肆虐的情況，而兩個超級大國又都參與到這一項目中來，它的確可被視作冷戰時期最重要的“干預第三世界”的行動之一。它與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近來探索的干預形式，有著明顯區別。⁹ 雖然它也涉及軍事、政治與經濟形式的干預，然而這一干預形式還包括其他諸多方面。這一計劃在世界各地實施的十年間，曾與當時許多武裝衝突嚴重的舊殖民地有所往來，包括 1967 年至 1970 年的尼日利亞內戰，印巴衝突，1971 年的孟加拉獨立，以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葉索馬裡（The Horn of Africa）的一系列武裝衝突。當時正值美蘇冷戰，SEP 項目卻持續依靠美蘇兩極之間的合作得以運行，它因而成為冷戰悖論中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由於兩個超級大國在第三世界的利益不斷增長，

的見解，見 “No Other Logical Choice”, *Global Malaria Erad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Parasitological* 40 (June 1998): 217-230. 也見 Randall M. Packard, “Malaria Dreams: Postwar Visions of Heal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Medical Anthropology* 17(1997): 279-96.

⁵ 白宮新聞發佈會，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見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Ex HE/MC, box 6,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Austin, Texas (之後的 LBJL)

⁶ 這大致相當於 HIV/AIDS 每年帶來的死亡人口，及每年因瘧疾死亡的人口數目的兩倍。數據見 www.globalheathfacts.org.

⁷ *The Global Eradication of Smallpox: Final Report of the Global Commission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Smallpox*, Geneva, December 1979 (Geneva, 1980).

⁸ 三百萬的數據，尤其參見 Micheal B. A. Oldstone, *Viruses, Plagues, & History* (New York, 198), 27; 其他參考物引用的數據則高達五百萬。哪怕是在二十世紀，天花的死亡率數據在時間和地域上都不可靠，因而很難從這些估摸的數字中判斷出準確的信息。但是如果這種流行病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年間，于短短一年不到就在全世界殺死了兩千一百萬人——並且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認為這一數據“也許大大低估了情況本身”——那麼八十年間三百萬的死亡人口則也合情合理。見 Alfred Crosby, *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 2nd ed. (New York, 2003), 207. 二十世紀戰爭的總死亡率見 Niall Ferguson, *The War of the World: Twentieth Century Conflict and the Descent of the West* (New York, 2006).

⁹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2005).

冷戰帶來的利益之爭也促使它們互相合作，並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這一項目——也很可能是唯一的類似情形——的成功。

然而，SEP 的故事不只是國際關係的一個案例，將它寫入冷戰史，還需要我們擁有對國際社會更為開闊的觀念，不僅要承認國際組織、NGO、多國合作以及跨國“知識共同體”在生產、循環、利用知識方面扮演的角色，還要把它們同國家角色結合起來加以關注。¹⁰這樣的整合將建立在新近一系列，全球發展史方面，有分量的、旨在探索國際組織與非國家角色重要意義的研究之上。繼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影響深遠的研究之後，阿米·史泰博（Amy L.S. Staples）的研究使我們思考上世紀國際史中，這些國際組織地位的上升和影響力的擴大。馬修·康奈利（Matthew Connelly）則啟示我們，需要具備“超越國家”的目光，以期理解那些在構想與執行層面，超越、甚至無視國界存在的各類運動。¹¹與此同時，醫學史的研究者也開始在更寬闊的國際政治視野下思考戰後的國際醫療行動。如果能將關注發展的國際史學者，同關注國際事務的醫學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則必將又有新的收穫。¹²

新近“去冷戰化”的冷戰研究所開闢的新路徑，也頗值得一談。¹³然而，冷戰仍舊是戰後歷史的敘事中心。雖然撰寫 SEP 的故事並不一定要涉及關於冷戰的敘事，但將它與冷戰結合起來的研究路徑，無疑將大大豐富我們以往的認知。本文旨在把消滅天花行動寫入冷戰歷史，突出 SEP 的歷史與冷戰史的交匯之處，從而對以往的冷戰研究有所貢獻。對 SEP 的回顧將有助於闡明這段歷史中三個重要的主題。第一，美蘇關係，尤其涉及兩國應對第三世界各個方面的關係。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闡釋已非常成熟，然而主要還是從超級大國互相競爭的角度出發，展開研究。依靠美國經費和蘇聯疫苗支持的 SEP 項目，將使我們得以追問超級大國之間的“合作”這一未被充分闡釋的、悖論性的題目。第二，這一研究將使我們重新理解國際組織與國際網絡扮演的角色。雖然它一直都是國際關係、國際法、社會學的熱門話題，但對歷史學家而言，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¹⁴最後，

¹⁰ 關於國際事務中的知識共同體，見 Peter M. Haa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 1 (Winter 1992): 1-35, 以及在那份特刊里的其他文章。

¹¹ 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CA, 2002); Amy L.S. Staples, *The Birth of Development: How the World Bank,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ve Changed the World 1945-1965* (Kent, Ohio, 2006); Matthew Connelly, “Seeing beyond the State: Population Control and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Past & Present* 193 (2006): 197-233; Matthew Connelly, *Fatal Misconception: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World Population* (Cambridge, MA, 2008). “超越國家邊界”一語呼應了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eaven, CT, 1998).

¹² 如見 John Farley, *To Cast Out Disease: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13-1951* (New York, 2004); Anne-Emanuelle Birn,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Rockefeller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Revolutionary Mexico* (Rochester, NY, 2006); Marcos Cueto, *Cold War, Deadly Fevers: Malaria Eradication in Mexico, 1955-1975* (Baltimore, 2007); Randall Packard, *The Making of a Tropical Disease: A Short History of Malaria* (Baltimore, 2008); Alison Bashford, “Global Biopolitics and the History of World Health,”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 no.1 (2006): 67-88

¹³ Matthew Connelly, “Taking Off the Cold War Lens: Visions of North-South Conflict during the Algerian War for Independe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2000): 739-69

¹⁴ 國際關係方面，見 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2007); in international law, see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2004); in sociology, see John Boli et al., “World Society and the

撰寫 SEP 的故事，將為新近興起的冷戰發展史提供新的思路。¹⁵將消滅天花行動寫入冷戰歷史，並不要求找到新的視角，但要求我們擁有更為開闊的視野。我們不僅要將 SEP 視為公共健康的項目，而且要考慮它深刻嵌入政治、價值觀、文化背景這些同戰後國際關係緊密關聯的諸多方面。

天花是一種由天花病毒 (*variola virus*) 誘發的嚴重傳染性疾病，通常經由呼吸管道進入人體。起初的癥狀，表現為發燒、疼痛和萎靡不振，之後幾天，周身會出現大量滿是膿水的膿包，主要集中于臉部、手、足這些部位。擴散的過程，從斑點到丘疹，再到膿包最後結成痂，大約經歷兩周左右。如果病人僥倖活下來，這些痂就會脫落，留下伊莉莎白一世小心用化妝品遮掩的疤痕，以及斯大林本人在官方相片里不斷粉飾的，那張得過天花的麻子臉。¹⁶幾千年來，天花一直是庶民的殺手，國王的刺客。它的致死率可能比任何其他病毒都高。有時，它也改變歷史的進程。在前哥倫布時代，它曾造成美洲人口的大量死亡。而近來一位歷史學家又宣稱，天花在美國獨立戰爭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¹⁷這一疾病衍生出一系列的變異，有的相對溫和，有的一旦染上則直接斃命。三分之二的天花感染者通常在兩周左右時間內死去，存活下來的人則獲得一輩子的免疫力。只是新生兒又成為下一批易感人群，使這種疾病千百年來作為地方性瘟疫，在世界各個角落廣為肆虐。¹⁸

引入疫苗的技術手段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所有這類技術，都需要先使健康的人體感染天花。因而接種者通常要冒著生命危險。詹納在 1796 年發現，將感染牛痘病毒 (*cowpox virus*, 與天花病毒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的牛身上取樣的膿包汁液注射到人體，人類就可以獲得對該病毒的免疫能力，而不必冒著感染天花的生命危險。¹⁹接下來的幾十年間，疫苗的使用傳到了歐洲和美國，也在帝國的 kontrol 下逐漸傳入了亞洲和非洲。²⁰但是在二十世紀初，天花仍舊是世界上很多地區的地方性疾病。此外，在許多地方，醫護人員與普通大眾非常反感接種疫苗。波士頓在 1901 年就曾遭遇一次天花的肆虐。二十五年以後，數據顯示，歐洲地區除俄國以外，每年因天花死去的人數在 700 人。對此一位國聯衛生署的官員深表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no.1 (1998): 144-81; John Boli and George M. Thomas, eds.,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 (Stanford, CA, 1999). 新近的研究回顧，見 Jeremi Suri,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Non-State Actors,”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ed. Patrick Finney (London, 2005), 223-46

¹⁵ 這方面可借鑒的研究見 Nick Cullather, “Development? It’s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24 (2000): 641-53 然而在這個發展勢頭大好的領域，它已經略有過時。

¹⁶ 關於伊莉莎白一世，見 Donald R. Hopkins, *The Greatest Killer: Smallpox in History*, 2nd 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Chicago, 2002); 關於斯大林患天花的經歷，見 Raymond Birt, “Person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Stalin,” *Political Psychology* 14, no.4 (December 1993): 616

¹⁷ 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1972), esp. 42-62; Elizabeth A. Fenn, *Pox Americana: The Great Smallpox Epidemic of 1775-82* (New York, 2001). 關於疾病對歷史的影響，也參見 William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1976).

¹⁸ Cyril William Dixon, *Smallpox* (London, 1962), chap. 10

¹⁹ 見前引，Cyril William Dixon, *Smallpox*, Chapter.12. “疫苗 (vaccine)” 這個詞來自拉丁語中的詞彙：牛 (vacca)，它在十八世紀為表彰詹納的發現而被創造出來。

²⁰ 疫苗傳入歐洲，見 Peter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Cambridge, 1999), chap.4.

懷疑，認為實際死亡人數應遠遠大於這一數字。²¹一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疫苗的推廣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歐洲和北美消滅了天花。然而即便如此，天花在南半球仍舊肆虐，尤其是在南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印度尼西亞以及古巴這些地區。²²

在日丹諾夫 1958 年呈給世界衛生大會，呼籲消滅天花的報告中，他強調了蘇聯國內消滅天花的成功。沙皇時代的俄國只是零星使用疫苗。到了紅色時代，情況有所不同。列寧于 1919 年頒佈的公共衛生方面最早的法令之一，就已明文規定，所有人口必須強制注射天花疫苗。²³列寧與斯大林對這一法令的積極推動，使蘇聯到 1936 年已經消滅了天花。蘇聯的領導人遂將天花的滅絕同控制其他疾病方面的成功一起，視作其統治合法性的標誌，並懷著驕傲予以慶賀。²⁴此外，有別於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一貫姿態，疾病控制倒一直是蘇聯願意在國際組織中積極參與的合作領域。雖然當時莫斯科和國聯其他成員國之間關係緊張、彼此猜疑，而且一直到 1934 年蘇聯才正式加入國聯，蘇聯與國聯在醫療領域的合作關係，卻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直緊密地維繫著。不僅如此，後者為抑制戰後蘇聯流行的斑疹傷寒，曾作出過重要貢獻。²⁵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雖然衝突仍在國際舞臺上佔據主導地位，在疾病控制領域，首先強調相互之間的合作，卻已成為一股思潮。²⁶當代一位圈內人士兼歷史學家就曾說過這樣的話：“在預防疾病傳播方面的國際合作一直持續著，不論其他方面的國際關係，變得怎樣敵對，競爭又如何激烈。”²⁷

日丹諾夫 1958 年的提議，折射出十多年來蘇聯拒絕加入國際衛生組織之外的一段重要歷史。日丹諾夫號召人們用蘇聯的辦法，在全球範圍內消滅天花。他提出一個五年計劃，強制對全球各地方所有人口使用疫苗（雖然該計劃也將無法推行這一措施的地區排除在外。）²⁸關於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的必要性，他提出的理由非常實際。日丹諾夫認為，世界正在不斷一體化，而病原的傳播也逐步趨

²¹ 未署名的備忘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box R940, folder 39435, 聯合國檔案，日內瓦，瑞士。

²² SAIE, chap. 8; Second Report on the World Health Situation, 1957-1960 (Geneva, 1963), 16

²³ A.T. Kravchenko, “Lenin’s Decree Concerning the Control of Natural Smallpox,” *Voprosy virusologii* 15, no. 1 (1970): 3-6; A.T. Kravchenko, “The History of Smallpox Eradication in the USSR,” *Zhurnal mikrobiologii, epidemiologii, I immunobiologii* 47, no. 2 (February 1970): 3-8. 感謝馬麗娜·伊萬諾娃 (Marina Ivanova) 在這條材料上給予我的幫助。

²⁴ V.M. Zhdanov, *The Control of Infectious Disease in the USSR* (Moscow, 1959).

²⁵ 見 Martin David Dub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sation,” esp. 67-69 and Marta Aleksandra Balinska, “Assistance and Not Mere Relief: The Epidemic Commission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20-1923,” esp. 93-99, 兩篇文章收錄在 Paul Weindling, ed., *International Health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1918-1939* (Cambridge, 1995)

²⁶ 關於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公共醫療的國際化，見 Sunil S. Amrith, *Decolonizing International Health: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1930-65* (New York, 2006), chap. I.

²⁷ Hans Zinsser, *Rats, Lice and History* (Boston, 1935), 293. 這本書自從出版以來就得到無數關注，時常為國際公共衛生領域的醫務工作者引用借鑒。更多關於這一思潮的內容，參見 James Wat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Health—A Modern Imperative,” 收於 Records Group (RG) 90, 第 42 盒, “國際合作年” folder (U.S.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即後來的 USNA)

²⁸ 對這些地區，日丹諾夫建議採用所謂的萊斯特體系，這一體系發端于十九世紀的英國，避開對疫苗的強制使用，而依靠監控、鑒定，以及對可疑病例的隔絕。見 Stuart M.F. Fraser, “Leicester and Smallpox: The Leicester Method,” *Medical History* 24 (1980): 315-32;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321-23. 結果是，相比統一強制注射疫苗而言，監控和有針對性的疫苗更促成了 SEP 的成功。

於全球化。雖然蘇聯已經在國內消滅了天花，但它仍舊受到狹長的邊境地帶——如伊朗和阿富汗這些地方——傳入天花的困擾，而每年都有數百人受到這一感染。此外，隨著航空旅行不斷增多，即便是不與任何感染地接壤的北半球國家，也不得不為防止疾病入侵而維持昂貴的疫苗支出，以保障本國人口不受侵害。日丹諾夫推測，統一協調的全球行動，相較于持續的疫苗供應，將為蘇聯這樣的國家節省一半以上的財力。如果國際衛生組織採取這一行動，他預測不出五年，人們就有能力“真正消滅”這一嚴重困擾對公共健康的疾病，不出十年，人類就能徹底戰勝天花。²⁹為了表明對這一行動的決心，蘇聯承諾，每年為之提供兩千五百萬劑量耐高溫的干凍疫苗。這種類型的疫苗在氣候炎熱、缺乏冷藏條件的地區，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³⁰

儘管這種實用的邏輯看似無懈可擊，它的政治語境卻還是使美國難以回應。從 1955 年起，世界衛生組織就致力於 MEP(消滅瘧疾項目，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 的縮寫)這一由美國資助、並在很大程度上為之所認同的項目。³¹在瘧疾項目中，蘇聯並沒有任何參與，且一直對該項目疑心重重，並將它認定為美國在第三世界擴大影響的一個例證。³²提議消滅天花，因而成為蘇聯在國際健康領域把握主動權的一次行動。意料之中的是，世界衛生組織最重要的“股東”，美國，並沒有為之表現出太多興趣。世界衛生大會也只是決定由總幹事出面，為這一行動可能需要的技術與資金，準備一份評估報告。³³

次年，蘇聯代表團繼續宣傳這一計劃。日丹諾夫宣佈，蘇聯每年生產一億劑耐高溫的疫苗，如果必要的話，國家生產量可以達到這一數字的三倍。他也提到，在 1958 年巴基斯坦天花氾濫的時候，蘇聯曾捐贈疫苗。日丹諾夫並承諾道，蘇聯將以同樣慷慨的疫苗捐贈，支持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的行動。他打賭，只要付出努力，天花在兩三年內就會成為歷史。日丹諾夫的發言結束後，代表們便就此展開了一系列討論。也有幾位代表發言，表示支持這一計劃。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代表團再一次保持沉默。關於這一問題，世界衛生大會 1959 年的年度決議案，強調了“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的緊迫性”，敦促所有流行天花的國家，即刻實施消滅天花，并要求總幹事為之提供援助、整理數據。³⁴然而，該決議案並沒有為這些目標籌措特別經費。在華盛頓方面看來，如果蘇聯想要在健康領域展示其對國際合作的熱情，他們完全可以同美國一起參加消滅瘧疾的計劃。³⁵

²⁹ “Eradication of Smallpox,” 508-12. 也見 SAIE, 366-71.

³⁰ Resolution EB22.R12, “Gifts of Smallpox Vaccine,” Executive Board, 22nd Session, Minneapolis, Minnesota, June 16-17, 1958, ORWHO 88:7.

³¹ 關於世界衛生組織展開 MEP 行動的邏輯，見 Jose Alvarez Amezcuita and Guillermo E. Samame, “The Philosophy Doctrine of the Concept of Eradication,” 8-9, 一九六二年十月提交給墨西哥弗雷德·索伯 (Fred L Soper) 會議的文章，見 RG 90, box 22,

“Association-APHA-Committee on Disease Eradication” folder, USNA.關於政治背景，見 Packard, “No Other Logical Choice”; Randall M. Packard, “Visions of Postwar Healt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ir Impact on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Frederick Cooper and Randall M. Packard (Berkeley, CA, 1997), 93-118; Socrates Litsios, “Malaria Control, the Cold War, and the Postwar Reorg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Medical Anthropology* 17, no.3 (1997): 255-78.

³² Siddiqi, *World Health and World Politics*, 142-143.

³³ “Smallpox Eradication: Report by the Director-General,” ORWHO 95 (12th WHA, 1959): 572-88

³⁴ ORWHO 95:324-332, 以及世界衛生大會決議案, 12.54, “Smallpox Eradication,” ORWHO 95 (12th WHA, 1959): 572-88.

³⁵ “Briefing Paper-United States-Soviet Relations in Health,” September 24, 1959, 由國際健康政

這時，消滅天花已經正式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重要任務。但是，沒有美國的支持，該項目在接下來幾年間依舊只是一紙空文，缺乏經費及人員支持。它的年度預算，大抵在十萬到二十萬美金之間，聘用了一位在日內瓦負責項目的醫療官員，以及另外四位掌控南半球各個天花流行地區的田野醫療工作者。³⁶每年在世界衛生大會上，蘇聯代表團都要將 SEP 緩慢的進展，世界衛生組織不冷不熱的態度，與該組織在瘧疾項目中巨額的投入進行比對（後者的開支在預算中佔據可觀的比重）。³⁷然而，幾年時間內，美國政府就改變立場，決定支持 SEP 項目。這一決策的形成，也體現了國際衛生專家的觀念是如何與國際環境的重大變化發生互動，從而促成政策發生轉變的。

MEP 項目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國際健康領域可謂聲勢浩大，但到了六十年代，該計劃已明顯走到了頭，且距離在全球範圍根除瘧疾這一目標差得很遠。³⁸引發瘧疾的寄生物是瘧原蟲 (*Plasmodium*)，它需要一種攜帶病毒的昆蟲，即瘧蚊 (*Anopheles*)，將病毒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身上。而 MEP 計劃的目標，就是通過使用合成的殺蟲劑(主要是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即 DDT)減少瘧蚊的數量，以便阻止這種傳播。在世界範圍內大量噴灑 DDT 是從二戰開始的，然而它卻導致了殘存瘧蚊數量的增殖，以及 DDT 給它們帶來的免疫能力的增強。此外，DDT 也因殺死了一大批蚊蟲，改變了食物鏈和生態系統，從而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備受指責。³⁹在這一方面，天花病毒的傳播並不需要動物帶菌體。天花通過近距離接觸，直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因而消滅它並不需要生態方面的大規模干預。天花也有其他流行病學方面的優勢。它的疫苗非常奏效，副作用少，而且歷史悠久。此外，天花病毒不能像黃熱病毒 (yellow fever virus) 那樣潛伏於動物體內，也不像脊髓灰質炎 (polio) 或者肺結核 (tuberculosis) 病毒一般潛伏在毫無癥狀的人體。事實上，所有未注射過疫苗的人，一旦感染病毒，就會表現出癥狀。而且，只有患者才能將病毒傳染給他人。

在 MEP 計劃前景不佳的同時，美國與其他地方的流行病學家，也開始將天花視為全球滅絕更為可行的目標。並且，由於健康領域的政府官員同政府外專業人士有著相似的社會背景、求學經歷、專業組織的會員身份，這一看法很快傳播開來。當美國公共衛生署國際健康辦公室主任詹姆斯·瓦特 (James Watt) 寫信致美國公共健康協會成員，詢問美國在消滅傳染病方面應採取的安全措施時，不少人就提議應當優先考慮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其中一人如是寫道：首先，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幾乎是“一定可行的”，相比之下在全球範圍消滅瘧疾，卻只是“也许可行”。⁴⁰另一個人寫道：不僅如此，在全球範圍內消滅天花，對全球共

策各局間委員會特為赫魯曉夫在一九五九年九月的美國之行撰寫，見 RG 59，國際經濟社會事務所辦公室，1945-1962 年之間檔案，“Internatioanl Health Program,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Int'l Health Matters,” USNA。這一報告建議美國將 MEP 作為一種“表達對國際衛生組織最大支持”的重要方式，並表示“歡迎蘇聯支持多邊行動。”

³⁶ Donald Henderson, “Smallpox Eradication- A Cold War Victory,” *World Health Forum* 19 (1998): 114.

³⁷ 可參見如 ORWHO 103 (第十三次國際衛生大會，一九六零年)：241-45; ORWHO 119 (第十五屆國際衛生大會，一九六二年)：102-05.

³⁸ Staples, *Birth of Development*, 161-71.

³⁹ 這是雷切尔·卡森 (Rachel Carson) 在《寂靜的春天》一書 (一九六二年) 的敘事重心。此書乃是環境改革運動一篇里程碑式的著作。

⁴⁰ 國家肺結核委員會主任 詹姆斯·珀金斯 (James E. Perkins) 致歐內斯特 (Ernest S. Tierkel) 的信，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一封科伯恩 (T. Aidan Cockburn)

同體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慘澹事實是，自人類自覺奮鬥以來，我們還未徹底根除某一項傳染性的疾病。如能通過自身努力，哪怕只有一次，證明我們有能力消滅一種傳染病，這將成為人類的榮耀。我認為天花項目正符合這樣的要求。”⁴¹

不過，要將專業共識上升到國際政治層面，還需要一個能讓政客支持該共識的恰當時機。1965年早春，機會來了。每年4月7日是“世界衛生日（World Health Day）”，也是世界衛生組織成立的紀念日。隨著MEP計劃的慘澹收場，以及越戰升級帶來的、美國在第三世界形象的持續跌落，約翰遜政府開始尋求在公共健康領域開闢國際合作的新方式。與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恰巧將年度主題定為“天花——警鐘長鳴”，以號召各成員國提高警惕，防止病毒從天花流行地區傳入已經消滅天花的國家。為什麼不讓總統此時在HEW（按：健康教育與社會福利署，Health, Edu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的縮寫）任命一名官員發表聲明，強調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可能的成功，並表達美國對世界衛生組織這一行動的堅定支持呢？白宮同意了；一份由HEW起草的聲明，隨即經過簡單校訂得以問世。⁴²

這份四月聲明，是美國首次在實際意義上支持日丹諾夫幾年前的提議。雖然它仍舊語焉不詳，但已為一個月后的具體承諾打下了基礎。1965年，聯合國慶祝其二十周年紀念，並特為此將該年定為國際合作年（按：ICY，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的縮寫）。為制定美國針對ICY的政策，約翰遜總統任命國際主義者、時任國際組織事務方面助理國務卿的哈倫·克里夫蘭（Harlan Cleveland），領導內閣級別特殊委員會，國際合作國家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該委員會的成員由政府官員與私人組織的代表共同組成。⁴³委員會一年大部份時間都在同內閣部門商定當年秋天的國際合作會議，為這一備受矚目的白宮大會籌備前期工作。約翰遜總統在前一年夏天的演說中，就曾提到，這一會議的目標，在於“尋找用知識為人類謀福利的新技術”，尤其是在對抗貧困、疾病和資源匱乏這些方面。人類不能再錯誤地為東西方、南北半球，畫上界限。所有的問題都是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也也是全球性的。美國應在這些方面，起到帶頭作用。⁴⁴

對約翰遜和他的幕僚而言，消滅天花恰如專家建議的那樣，是一項花費和爭議都相對較小，又能展現美國致力於推動全球合作形象的計劃。世界衛生大會5月在日內瓦召開例會時，白宮就同克利夫蘭及美國代表團一起，起草了一份措辭恰當的總統宣言。⁴⁵宣言于5月18日發佈，與大會安排在同一天。宣言指出，

的備忘錄也將天花列為首先要在全球範圍內消滅的傳染病，見RG 90, box 22,

“Association-APHA-Committee on Disease Eradication,” folder, USNA.

⁴¹ 珀金斯給瓦特(Watt)的信，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原文加下劃綫，RG 60, box 22,

“Association-APHA-Committee on Disease Eradication” folder, USNA.

⁴² 列維（Levy）致霍博恩（Holborn），以及霍博恩致霍洛維茨（Horowitz）的信，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Ex HE/MC, box 6, LBJL.

⁴³ 白宮新聞發佈會，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RG 90(Records of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box 24,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Committee),” folder, USNA.

⁴⁴ “President Johnson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Affairs Outline, 196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RG 90, box 2, fold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USNA.

⁴⁵ 克利夫蘭致卡特（Cater），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十五日，以及卡特給約翰遜總統的信，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Ex HE/MC, box 6, LBJL.

雖然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已經消滅了天花，然而這種疾病卻仍舊在世界上許多地方肆虐流行。“只要它還存在于世界的某個角落，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真正置身事外。”總結了新近的專家共識之後，約翰遜宣稱，全球消滅天花的“技術”問題“非常小”，而“管理層面”，包括保障疫苗供應、協調人員及各方面的問題，則又可以通過國際合作得到解決。總統既已賦予國際合作年以“尋找為人類謀福利的新技術”之使命，如今“尋找提高世界健康水平的新方法，又進一步啟示人們，要通過國際合作的方式，降低人類的死亡率。”宣言總結道：美國將“時刻準備與其他利益相關的國家合作，到 1975 年，徹底將天花掃入歷史的垃圾堆。”⁴⁶

總統宣言雖然沒有詳細論及美國將採取的行動，以及可能捐贈的物資，然而這一戲劇性、公開的，來自總統本人的承諾，無疑在 SEP 項目的支持者中引起了巨大反響，並為之提供了切實的幫助。在日內瓦，美國代表團驕傲地向世界衛生大會宣佈了美國的這一承諾，並向國內報告：大會“對這一宣言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主要官員也“表達了對總統宣言的深深謝意”。另外，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此後特向美國代表團表示祝賀，認為“宣言內容完美，頒佈時間也很及時。”⁴⁷幾天之內，美國代表就赴往瘟疫流行地。他們得到當地美國的流行病學家的提醒，很快開始制定落實項目的具體方案。“如果能把防禦天花同美國支持的健康項目結合起來，它必將成為展示總統關於消滅天花這一承諾的‘最佳時機’。”當時代表團中，有一位成員這樣寫道。⁴⁸

新近獨立的一些國家，也試圖抓住這個機會。上沃爾塔（Upper Volta）衛生部部长保爾·蘭賓（Paul Lambin）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他在聽聞美國在世界衛生大會的承諾后，于照例訪問華盛頓之時，聯絡了美國國際發展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簡稱 USAID）的官員，使他們瞭解發展中國家消滅天花的迫切願望。⁴⁹5月18日的宣言，使得消滅天花得以走出專家的話語圈，並初步深入到國際政治討論與高層外交商議的領域。這一年晚些時候，在約翰遜助手們新一批彙編的、拿給總統審批的國際健康項目中，SEP 的進展已非常引人注目。⁵⁰到那時為止，美國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的承諾已然具體成型。

然而，從政治工具的意義上講，這篇國際合作的華麗文章在美國國內，畢竟影響有限。當約翰遜向美國人描述其支持 SEP 的決定，以及他發動醫療領域國際合作背後的，試圖超越、化解冷戰衝突的動機時，美國國內官員只是將它視為冷戰中傳統的競爭行為，並將其意義詮釋為：在貧苦、被專制壓迫的人群中，

⁴⁶ 白宮新聞發佈會，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見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Ex HE/MC, box 6, LBJL.

⁴⁷ US Mission, Geneva, telegram to SecState, May 19, 1965, RG 59, box 3159, folder “HLTH 3, Organizations and Conferences, WHO, 6/1/65,” USNA.

⁴⁸ US Embassy, Lôme to DOS, May 22, 1965, RG 59, box 3172, folder “HLTH-Health and Medical Care-T”, USNA.

⁴⁹ Lambin 與 Walter Sherwin 的會議備忘錄，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RG 286, box 27, “HLS, Health” folder, USNA. 上沃爾塔于一九六零年從法國獨立出來，于一九八四年重新命名為布基納法索（Burkina Faso）。

⁵⁰ Joseph A. Califano, *The Triumph & Tragedy of Lyndon Johnson: The 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 1991), 114.

預防共產主義思想的散佈。一位行政官員在解釋美國政策的演說中（“在全球範圍對抗疾病”），就曾提到，“三分之二的人每年依靠不到一百美元過活。他們活不到三十五歲就要死去。不僅如此，還承受各式各樣傳染性疾病的困擾”。他問道：“這對美國意味著什麼？我且不談全人類福祉這些軟的方面。我只談硬的方面，即自身利益的問題。共產主義最好的溫床便是瘟疫與貧窮。如果我們要打擊共產主義，創造一個自由的世界，就必須為這些窮苦人的健康做些實事。”類似的援助將會成為一件“穿透銅牆鐵壁，抵達人心深處”的“工具”。它將促進世界和平，彰顯美國作為“醫療大國”的軟實力，幫助美國同盟共同打擊共產主義勢力。“要是因為疾病纏身，使人們無法拿起武器站立起來，形成抵抗共產主義入侵的聯盟，那麼美國的利益也便受到了損害。”⁵¹因而美國對 SEP 的支持，于不同的人群也有了不同的意義。對國際團體以及美國國內的國際主義者而言，它意味著超越冷戰。對強硬的反共人士而言，它意味著贏得冷戰的勝利。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同蘇聯合作消滅天花，也是幫蘇聯自取滅亡。

可是現實之中還有更實際的事情必須首先處理。其中一件，SEP 項目總共需要超過二十億劑疫苗，而只有蘇聯有能力作此供應。⁵²所以當美國公共衛生局傳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 簡稱 CDC）傳染病監控主任唐納德·亨德森（Donald A. Henderson）前往日內瓦，領導這一項目之時，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確保蘇聯能夠繼續維持對疫苗的供給。⁵³他的位子坐得並不舒服。蘇聯人一開始就對他的任命很不滿意。他們曾向 SEP 抗議，認為該項目既然是由蘇聯提出的，就理應由俄國人出任這一職務。所以次年五月，在世界衛生大會召開的間隙，當亨德森走近俄國代表團主席德米特裡·韋涅季克托夫（Dmitry Venediktov），要求後者繼續供應疫苗之時，他的心中充滿了憂慮。然而據亨德森回憶，俄國人的回答使他吃了一驚。他被那位俄國官員告知：“我想讓你知道，我們已經對你做過審查。現在我們相信你是一位誠實的、品質良好的科學家，你的目的是為了消滅天花。我們將全力支持你。”韋涅季克托夫解釋道，他也不能向美國保證一年有多次疫苗供應，然而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確保每年供應一定批量的疫苗，應該不成問題。⁵⁴

亨德森很可能因遭到蘇聯“審查”而感到不悅，然而他繼續將兩國友好合作放在首要位置，並為之付出了辛勞的努力。在擔任項目主任的這段時間里，他總是謹慎地將發起者的榮耀，歸于蘇聯名下。他也同俄國官員緊密合作，解決問題，一旦出現狀況，比如疫苗供應出現質量問題，他能在保全蘇聯人面子的基礎上，進一步尋求解決方案。他總是教導世界衛生組織的同事們，同蘇俄的關係“非常完美”；為防止雙方關係緊張化，任何只要能通過“時間和毅力，平靜、有效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做“公開討論”。⁵⁵每一年世界衛生大會之前，亨德森都要同美蘇雙方的代表團會面，報告項目進展情況，並依靠他們之間的合作使事務提上日程。亨德森也依靠美蘇兩國派駐疫區的外交人員的幫助，對缺乏有效合作的

⁵¹ 日期不明的檔案，Office Files of Joseph. A. Califano, box 29(1737), “Health” folder, 原文加下劃綫，LBJL.

⁵² SAIE, 469, 564.

⁵³ Chief SE 給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備忘錄（機密），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Smallpox Eradication Program papers, box 303, folder 30, 世界衛生組織檔案，日內瓦，瑞士（後來的 WHOA-SEP）。CDC 後來改名為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但縮寫仍舊保留。

⁵⁴ Henderson, “Cold War Victory”, 115-16

⁵⁵ 天花項目主任致傳染病主任的備忘錄（機密），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WHOA-SEP, box 303, folder 3.

世界衛生組織地方官員以各國衛生局官員，施加壓力，並當面批評那些不彙報進展的疫區代表。亨德森同韋涅季克托夫，及其他蘇聯官員一起，建立並維持了蘇聯疫苗的質量監控措施，還有俄國人擔任項目職務的審查工作。最後，莫斯科研究所病毒中心同美國亞特蘭大 CDC 實驗室一起，承擔了在該領域進一步分析樣本的任務。⁵⁶

據亨德森回憶，唯有一次冷戰的緊張氣氛影響了 SEP 項目完美的合作氛圍。在 SEP 的最後幾年，距離徹底消滅天花的目標越來越近，卻又尚未實現。一位瑞士的醫生兼項目顧問，為了鼓勵大家為“零天花 (smallpox zero)”的目標繼續奮鬥，引用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 1968 年的小說《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 中，強調一切科學研究在完成之前“最後一英尺”(the final inch) 之重要性的語句。這一引用在項目參與者中間廣泛傳播，“最後一英尺”也成為鼓勵人們發掘索馬裡最後的疫情時，常會提到的語句。當“零天花”的時刻終於到來，需要撰寫最終報告，彙報項目情況的時候，蘇聯方面的撰寫人伊萬·拉德尼(Ivan Ladnyi)卻堅持文中絕不能提到這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名字，以及他曾寫過的句子。⁵⁷亨德森寫道，在整個全球消滅天花的行動中，“這是兩個超級大國完美合作中的唯一敗筆”。⁵⁸

由於亨德森迫切地想將 SEP 項目塑造成“冷戰勝利”的一個模型，他很可能在美蘇順利合作的方面，做了過多強調。相比之下，檔案的記錄則可能反映出這段合作相對脆弱的一面。另一方面，關於兩國合作的大前提，記錄也相當明確：如果沒有美國的資金支持與蘇聯提供的疫苗供應，或兩個超級大國的制度保障與政治支持，SEP 可能根本無法推行，遑論成功。項目總共九千八百萬美元的開支，大約有三分之一，來自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的預算，而美國又是這些組織主要的資金供應者；此外，華盛頓還直接向項目撥款兩千五百萬美金。⁵⁹當然，這筆錢相對於同期美國軍事支出微不足道，花在瘧疾項目上的資金甚至都要超過這筆錢，可如果沒有這筆資金也就沒有 SEP 最後的成功。與此同時，蘇聯為 SEP 提供了大批量的疫苗供應，在全球消滅天花的行動中使用的兩億劑疫苗，總共將近一億七千萬劑疫苗是蘇聯生產的。⁶⁰

如何解釋冷戰時期兩大敵對勢力之間的合作？我們當然可以將它歸因于 SEP 運作不受兩國政府干涉的獨立性。一旦政府就對項目表示初步贊同——比如克林姆林宮在後斯大林時期的語境下提出“和平共處”，又比如以及白宮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對國際合作的強調——你就不能指望它一直對項目保持興趣。

⁵⁶ 亨德森致 DG 助手佩恩 (Payne) 的信，“簡要彙報——赴莫斯科討論與 SEP 項目相關事宜”，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WHO-A-SEP, box 303, folder 30; Henderson, “Cold War Victory”, 116-17.

⁵⁷ 《第一圈》寫的是被囚禁的蘇聯科學家們為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放棄道德立場則而為斯大林統治效勞的故事。對蘇聯的流行病學家而言，這自然是一個讓人不舒服的話題。題目暗指但丁《神曲》中著名的對古希臘哲學家處境的描述，住在離地獄只有一牆之隔的綠色花園之中享受安寧。

⁵⁸ Henderson, “Cold War Victory”, 119.

⁵⁹ SAIE, 464. 其它捐贈超過一百萬美金的國家有瑞典，荷蘭，加拿大，丹麥，以及日本造船工業基金會。

⁶⁰ 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九年間，據雙方共同記錄，蘇聯為感染地區貢獻了十四億計量的疫苗，美國則貢獻了一點九億劑疫苗，大多為西非與中非地區所用。此外，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四年，蘇聯還向世界衛生組織促進健康志願基金會消滅天花特別帳戶，捐贈超過兩億九千八百萬劑疫苗（該基金會總共獲得四億六千五百萬劑捐贈），美國只捐贈了二百四十萬劑。

畢竟，SEP 並不能對第三世界的政府產生如約翰遜救援印度飢民那樣的，立竿見影的效果。⁶¹有了最初的政治認同以後，項目的進展就要依靠像韦涅季克托夫和亨德森這樣的中層的技術專家之間的相互合作。這些人有著相似的科研背景，技術競爭力，以及所在組織為其保障的經濟實力，使其意見得以超越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這也為之提供了不受監督、更為自由的行動空間。因而當長期擔任 CDC 執行官的大衛·森切爾（David Sencer）總結道，為保障美國公眾的健康安全，有必要向孟加拉國撥出人員和經費以助其消滅天花之時，幾乎沒有人向他提出質疑。⁶²以往的研究外交史學者總是關注國際事務的決策與影響，這些例子卻向我們表明，要理解全球消滅天花的行動，其實不必總在國家之外找尋線索，而應當深入透視並破除國家框架的束縛，發掘那些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決策是如何在白宮、國會、議會之外形成的。

SEP 的合作也展示了文安立繼社會理論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研究之後提出的觀點：兩個政治與價值觀互相碰撞的超級大國，尤其在面對第三世界的時候，將表現出“高度現代”（“high modernist”）的本質與基礎。⁶³在上述語境中，除去社會結構方面的安排，蘇聯人和美國人在醫療和科技方面就什麼是“高度發達的”社會達到了意見上的統一，並能夠在南半球運用共享的“現代”知識與技術，為這一目標的實現開展合作。這也是約翰遜在宣佈支持 ICY 之時，以“科學年”的口號呼籲“緩解兩國緊張，使人與人之間的獨立轉向人與自然的對立”，以便使冷戰對立的雙方從“緊張之中”緩解出來，“開始繪製超越冷戰政治的新路線。”號召人們通過科學戰勝自然的邏輯，本身也已深深嵌入蘇聯國家核心理念之中，對蘇聯的領導人和技術人員而言並不陌生。⁶⁴

當然，美國和蘇聯對於第三世界發展的設想，並無重合之處。許多學者也已討論過美蘇冷戰在南半球是如何“競爭共存”的。⁶⁵諸如 SEP 這類項目背後的知識王國，也同樣充滿競爭。發展研究領域的學者一直以來，格外關注這些科學知識的代表在爭取權力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國際發展史方面的許多研究，遂將目光放在對“發展”和“現代性”知識、權力的話語解構上，認為這種發展的歷史所揭露的正是北半球亦即西方世界，同第三世界殖民關係的本質。⁶⁶美國外交關係方面同發展項目有關的研究，也呈現出相似的面貌。它們常將美國在二十世

⁶¹ Kristin L. Ahlberg, “‘Machiavelli with a Heart’: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Food for Peace Program in India, 1965-1966,” *Diplomatic History* 31, no.4 (2007):665-701.

⁶² 森切爾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擔任 CDC 主席。關於他和 CDC 在 SEP 項目中扮演的角色，見 Elizabeth W. Etheridge, *Sentinel for Health: A History of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Berkeley, CA, 1992), chap. 14; 也見勞倫斯（Lawrence Brilliant）致卡利法諾（Califano）的信，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版權歸作者所有。

⁶³ Westad, *Global Cold War*, 397.

⁶⁴ “President Johnson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RG 90, box 42, fold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Year,” USNA, 關於那些年“高度現代”的特徵和意義，見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關於美蘇兩國在經濟方面的一致與不一致，見 David C. Engerman, “The Rom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Historie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28, no.1 (2004): 23-54

⁶⁵ Nick Cullather, “Damming Afghanistan: Modernization in a Buffer Stat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9, no.2 (September 2002):512-37; David Ekbladh, “‘Mr. TVA’: Grass-Roots Development, David Lilienth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s a Symbol for U.S. Overseas Development, 1933-1973,” *Diplomatic History* 6, no. 3 (2002): 335-74.

⁶⁶ 關於發展作為知識/權力方面的研究數不勝數。如可參見 Cooper and Packar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尤其是介紹部份以及第二、三章；以及 Frederique Apffel Marglin and Stephen A. Marglin, eds.,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Oxford, 1990), 第四、五章。

紀初“改善”殖民地的作為，同戰後的發展援助畫上等號。⁶⁷那些被宣傳為大公無私的項目，實際上最能反映美國利益；而即便出發點是好的，也要同其他種族進行妥協，或在實踐層面有所轉變。冷戰知識份子所親暱的普世主義理論，很快就證明無法適應于地方狀況。結果，發展項目通常非常混亂，具備一定的破壞性。⁶⁸在某種程度上，消滅天花的過程十分符合上述敘事，然而在另一些方面，它又呈現出與上述敘事截然不同的面貌。

SEP 一個重要特徵是將同質化的現代科技知識，運用到南半球複雜的地緣環境之中。而這些地區已經建立起長期應對天花的措施，並嘗試解釋與美化人類遭遇天花的境況。的確，在 SEP 組織的核心層看來，對疫苗生產、質量、技術、監督方法與控制，乃是這一項目的主要目標，以及全球消滅天花的必要條件。因而，在許多地方，SEP 的項目成員不得不與當地的衛生官員聯合起來，同這一套已經融入民間信仰體系、應對天花的醫療辦法，展開競爭。比如，在西非的一些地區，SEP 的項目人員要同古老的天花“神靈”(Sopona)的巫師們互相合作，而在印度，項目組則須與印度天花女神(Sitalā mata)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儀式打交道，并同這種信仰系統展開競爭。⁶⁹與此同時，在阿富汗鄉間，SEP 的疫苗工作者得繞開蒙在女子與孩童臉上的薄紗，小心翼翼地進行接種工作。⁷⁰他們還要讓人們放棄長期存在的人痘接種的辦法，用 SEP 提供的疫苗替換其結痂粉末。項目成員不僅要在各地立法層面推行這些措施，還要四處散播標題為“父親放棄了人痘接種的工作，并鼓勵他的兒子為感染者接種疫苗”這類恰當的道德故事。⁷¹

項目目標的本質不是基本控制天花疫情，而是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這意味著要克服一切可能阻礙統一目標的抵抗行動，不論是通過協商解決，還是直接予以消滅。對那些抵制疫苗的個人，項目組將採取多種形式，為其施加壓力：持續進行口頭勸說；對其施加輿論或者法律方面的壓力；給予報酬；在極端的情況下，採用軍隊式圍剿，強制為其注射疫苗。⁷²雖然用武力強制推行疫苗的狀況並不常

⁶⁷ 如參見 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NC, 2000), chap. 12.

⁶⁸ 如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2003); Cullather, "Damming Afghanistan"; David C. Engerman et al., eds.,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Amherst, MA, 2003).

⁶⁹ SAIE, 716,887-88. 關於印度疫苗和人痘接種的批判性研究，見 Frédérique Apffel Marglin, "Smallpox in Two Systems of Knowledge," 收錄于 Apffel Marglin and Marglin, eds., *Dominating Knowledge*, 102-44.

⁷⁰ 亨德森給米勒(Millar)的信，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WHO-SEP, box 159, folder 378.

⁷¹ 見 SEP 項目阿富汗方面主任(A.G. Rangaraj)的陳述(未署日期)。關於項目組同人痘接種習俗的競爭，也參見 SE/HQ 主席給地方長官，東南亞地方司(SEARO)的信，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在信中，亨德森抱怨道，阿富汗政府並沒有宣佈人痘接種為不合法的舉動。另參見亨德森給霍甲(Khwaja-Waisuddin)，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的信；亨德森致霍甲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的信；亨德森致阿富汗方面主任(A.G. Rangaraj)的信，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以及一份由 Vladimir Sery, Svend Brøgger, Amin Fakir, Aminullah Saboor 共同協作的日期不明的報告。以上見 WHO-SEP, box 159, folder 378.

⁷² Paul Greenough, "Intimidation, Coerc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Final Stages of the South Asian Smallpox Campaign, 1973-1975,"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1 (1995): 633-45. Lawrence Brilliant and Girija Brilliant, "Death for a Killer Disease," *Quest* (May/June 1978): 3-10. 布里連特回憶了他是如何帶領一群疫苗工作者，在深夜闖入印度南部某地區的一族長家中的。這一族長相信，抵制疫苗是他的宗教使命，他奮力抗爭了一陣后，終於屈從地接受了疫苗注射。

見，項目的推行在許多地區，還是伴隨著不同程度的抵抗。人們早先將這種抵抗視為“傳統”信仰對現代科學的抗拒，然而研究表明，類似的傳統信仰並不直接與抵抗疫苗相關聯，之前的預設也就遭到質疑。相反，實際情形通常是，由於疫苗行動總是與政府或者其他權力結合起來，使項目意圖遭到當地人的誤解。在相對封閉的地區，當地人只要看到政府官員，便聯想到徵稅、徵兵，以及其他剝削行為，因而，他們對這些外來人員的動機和意圖深感懷疑。⁷³亨德森承認，自己從不相信抵抗問題的存在。他曾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一位印度的同事，“大多數關於抵抗的故事”都是“那些懶惰的健康官員構想出來的.....他們寧可坐著，也不願到處走走，以此為人們拒絕注射疫苗找尋藉口。”⁷⁴然而這一方面的報告就不太樂觀了。一本印度的 SEP 項目培訓手冊是這樣解釋抵抗現象的：抵抗行為“通常是相對的，而非絕對。因而團隊應當要做好堅持不懈的應對準備。”此外，手冊還意味深長地提到：醫護人員應當將拒絕注射疫苗者的名單彙報給上級機構。⁷⁵

不過總體而言，對 SEP 的抵抗多以個人方式出現，沒有形成組織及一定氣候。在項目涉及的廣闊、多樣的地域範圍里，它並既沒有遇到從前在歐洲及北美常見的那種抵抗運動，也沒有遇到肺結核疫苗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印度推廣時，曾遭遇過的大規模群眾抵制。⁷⁶因而 SEP 的故事，不僅是地方抵抗國或與國際權威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南北、東西半球互相和解、互相認識、互相合作的故事。畢竟，運作這一項目的國際官員及專家，要在社會各個層面同無數瘟疫流行區的個人展開合作，此外，SEP 約十五萬以上的田野醫療工作者（占項目成員的大多數）也都來自於當地社會。⁷⁷

某種程度上，也正因為這種與當地力量的聯合，項目展示出它在方法上非凡的靈活性，使其得以適應於當地的政治狀況、管理情形、流行病疫情與文化形態。項目啟動之後不久，人們便發現，百分之百的疫苗注射率很難實現。項目組很快就將重點放到“監督與遏制”上，及早發現流行病例，並致力於為疫區周邊的居民注射疫苗，以阻止天花進一步蔓延。⁷⁸SEP 項目在像尼日利亞、孟加拉國、索馬裡這樣內戰頻仍、動盪不安的地區得以長期運行，並且時常需要與相關的政府和黨派進行協商，以便穿越衝突地帶執行任務。這足以證明 SEP 項目本身比較富有彈性。最後，SEP 與冷戰時期那些致力於國際發展的項目非常不同。它成功

⁷³ 這是 SEP 項目早期，在達荷美共和國（Dahomey）與多哥（Togo）兩個非洲國家共同的研究結論。見 G.E. Robbins, “The Role of Fetish Practices in Vaccination Campaigns,” *The SEP Report: Seminar on smallpox eradication and measles control in western and central Africa, Proceedings of a meeting held in Lagos, Nigeria, May 13-20, 1969, Part I*. 未出版的 CDC 報告，WHO/SEP, box 52, folder 208.

⁷⁴ 亨德森致德（De）的信，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WHO/SEP, box 193, folder 436.

⁷⁵ Smallpox Training Seminar, Bhopal, April 29- May 3, 1974. 也見 Ian D. Carter 致 R.N. Mitra 的秘密報告，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皆存 WHO/SEP, box 194, folder 388.

⁷⁶ Michael R. Albert, Kristen G. Ostheimer, and Joel G. Breman, “The Last Smallpox Epidemic in Boston and the Vaccination Controversy, 1901-1903,”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4, no. 5 (February 2001): 375-79; Niels Brimnes and Christian W. McMillen, “Medical Modernization and Medical Nationalism: Resistance to Mass Tuberculosis Vaccination in Post-colonial India, 1948-195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 History* 52, no.1 (2010): 1-30. 感謝這些作者提前致我的文本。

⁷⁷ Jonathan Tucker, *Scourge: The Once and Future Threat of Smallpox* (New York, 2001), 3.

⁷⁸ D.A Henderson, “Surveillance-The Key to Smallpox Eradication”, WHO document no. WHO/SE/68.2, WHO Library, Geneva, Switzerland.

于 1977 年底實現了“零天花”的目標，只比約翰遜總統設定于 1965 年的時間表晚了兩年。

一方面，國際衛生組織選擇打擊最可能滅絕的疾病，從而實現成功的目標，而沒有直面最緊迫的健康問題。即以最少的爭議，在國際社會樹立了獨一無二的權威性。誠如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說：“有了疫苗，我們認識了天花。”⁷⁹但這還是不是消滅天花故事的全部。畢竟，疫苗在很久以前已經具備，它本身並不能完全解釋全球消滅天花這一勝利性的結局。消滅天花，還需要有能力將健康問題看做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以及更進一步，將它視作一個可以全球解決的問題。在這個方面，世界衛生組織作為組織前提，對 SEP 項目發揮了重要的意義。它通過自身的國際權威性，折射出並形成了將疾病視為全球問題、在全球範圍予以解決的這一理念，並為這一理念從形成、辯論、到最後全球範圍內的實際執行，提供了制度框架。⁸⁰或者更重要地，為冷戰中兩個根本不可能互相承認的超級大國，提供了一個中立的、可信賴的組織平臺。

然而，世界衛生組織與 SEP 的關係非常複雜。雖然通常意義下，SEP 經常被視為該組織的重要成就，然而在執行的過程中，它卻常常遭到來自世界衛生組織各部門、出於各種理由的反對意見。世界衛生組織最高層官員，包括長期擔任總幹事的巴西流行病學家馬科利諾·坎多（Marcolino Candau），起初就明顯沒有熱情。坎多于一九五三年至 1973 年擔任總幹事，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習公共健康專業，一直是瘧疾問題方面的專家。在南美抵抗瘧疾的行動中，他曾拔掉自己感染了病毒的牙齒。⁸¹在他看來，MEP 項目未獲得成功，乃是對世界衛生組織信譽的巨大打擊。如果天花的項目步其後塵，對世界衛生組織未來的聲譽而言，更將造成致命一擊。畢竟在當時，許多人都認為，消滅天花意味著要給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注射疫苗，這一目標完全不切實際。此外，一些科學界的知名人物普遍認為，任何試圖徹底消滅任何傳染性疾病的計劃，都將牽動一系列生物、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後果，從而阻礙這類目標的最終實現。在當時一本暢銷讀物中，一位知名的專業人士宣稱：類似的計劃，正反應了現代人的傲慢自大。它們就好比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烏托邦，為著“圖書館書櫃上一樣新奇的物件”而努力，卻終究將淪入歷史的垃圾堆，使人羞愧。⁸²

所以在 1965 年五月，當世界衛生大會的成員國一致決定把全球消滅天花視作組織的“主要目標”時，世界衛生組織高層的官員們卻感覺受到了束縛。⁸³一方面，他們無法置大會的決議于不顧。另一方面，他們想要把該項目置於掌握之中，確保它不使組織尷尬，也不妨礙組織其他首要任務。在他們看來，倘若美國真的像約翰遜總統承諾的那樣，致力於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那麼它最好領導這一行動並為之提供經費。因而那年秋天，世界衛生組織的高級官員，堅持要求美國政府派遣曾在日內瓦擔任天花諮詢委員會委員的亨德森，領導整個項目。⁸⁴次年

⁷⁹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ature of Mass Poverty* (Cambridge, 1979), vi, 引自 Cullather, “Development? It’s History,” 651.

⁸⁰ 關於建立健康領域的國際權威，見 Staples, *Birth of Development*, chap. 9.

⁸¹ *Ibid.*, 143-44.

⁸² René Dubos, *Man Adapting* (New Haven, CT, 1965), 379. 也見 SAIE, 388.

⁸³ US Mission, Geneva, telegram to SecState,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RG 59, box 3159, folder “HLTH 3, Organizations and Conferences, WHO, 6/1/65,” USNA.

⁸⁴ 亨德森宣稱自己接受這份工作，是情勢所逼。然而其他證據表明，他非常想要得到這一任命，並為之耍了一些手段。相關情況可比對亨德森在“Cold War Victory”中的自序（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一十五頁）與對 CDC 長官（1966-1967）大衛·森切爾的口述採訪（版權歸維多

春，當坎多提交 1967 年預算的時候，他提出為天花項目撥款二百四十萬美金，作為項目資金。這比前一年相關開支增加了百分之十六，比起往年則更為豐厚。當一些發達國家代表抱怨難以接受這一增長幅度，仿佛早有預料的坎多玩笑地稱，完全可以將 SEP 的開支縮減。他傳遞的信號非常清楚：SEP 項目絕非世界衛生組織的首要任務。如果美國和其他國家對此有所堅持，他們就需要自己掏錢。⁸⁵但是，倘若總幹事將預算要求視為商議性的策略，那麼南半球的代表就會贊同這項表面對他們有利的提議，并贊同它的推行。各方遂就此在會上展開了一場辯論。法國和美國削減預算的提議被投票否決，總幹事的提議，包括對 SEP 項目二千四百萬美金的總投入，由於得到發展中國家的擁護，獲得通過。雖然票數並不多，但還是達到了三分之二代表的贊成，成為世界衛生組織預算表決史上最僥倖的一次勝利。⁸⁶

坎多很可能為自己的成功感到驚訝，而美國的外交官們則明顯為第三世界表現出來的自決意願感到不快。⁸⁷然而美國政府內部的想法並不一致：一直試圖尋求美國對 SEP 項目扶持的亨德森，及他的支持者，為此感到非常愉快。那年秋天，亨德森便作為項目主席抵達日內瓦，從 1966 年集中發動項目，到 1977 年成功消滅天花，一共工作了十一年。這段時間里，他一直受雇于 CDC。他的工資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發的，而是由美國政府提供。在地方上，SEP 大多數醫療與行政官員，以及諮詢顧問，都不是從世界衛生組織原有職員中調配進入項目的——這些俄國人，瑞士人，接客人，埃及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他們的工資或者由各自政府支付，或者直接由 SEP 項目負責。⁸⁸與此同時，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尤其是那些重要地區辦公室、解決過實際問題的官員，常常對項目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⁸⁹許多人想要世界衛生組織專注于基礎的衛生防護工作，因而對 SEP 狹隘的目標存有疑慮。這些人常將 SEP 看作一件無關緊要事，甚至是有悖于發展基礎健康設施的目標，分散組織注意力的行動。就在世界衛生大會投票表決後幾個月、SEP 項目正式啟動之際，坎多的兩名高級代表就起草了一份致各地區的備忘錄，指出“設立永久基礎健康設施應當放在第一位，因為它是任何地方實現消滅天花目標的基礎條件。”備忘錄並指示世界衛生組織的職員，要“準備考慮從天花項目的資源中進行調配，以便發展、鞏固地區基礎健康設施，為消滅天花打下穩固基礎。”⁹⁰

從這個角度看，SEP 項目的成功只是把問題複雜化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利亞·哈登所有，二零零六年七月七日，第十六頁）。也可參見 US Mission, Geneva, to DOS,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RG 59, box 3162, folder “HLTH 9-2, Prevention, Control, Eradication, 1/1/64”, USNA; US Mission Geneva to SecState,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四日，RG 59, box 3159, folder “HLTH 3, WHO, 10/1/65,” USNA.

⁸⁵ 相關討論見 US Mission, Geneva, to DOS,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以及許多其他 DOS 急件，一九六六年春，RG 59, box 3160, folder “HLTH 3, WHO, 1/1/66,” USNA.

⁸⁶ ORWHO 152 (19th WHA, 1966): 258-264, 288-296; US Mission, Geneva, to SecState, May 12, 1966, RG 59, box 3160, folder “HLTH 3, WHO, 5/1/66,” USNA; SAIE, 414-16.

⁸⁷ 西斯科 (Sisco) 致塔比 (Tubby) 的信，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RG 59, box 3160, folder “HLTH 3, WHO, 5/1/66,” USNA.

⁸⁸ SAIE, 437-44.

⁸⁹ 這類組織內部抗議見 SEARO Regional Director 致世界衛生組織 HQ 的“高度保密”備忘錄，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WHO-SEP, box 159, folder 378; SEARO Regional Director 致 DG 的信，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WHO-SEP, box 193, folder 416. 也見 SAIE, 417-18; Henderson, “Cold War Victory”, 114-15.

⁹⁰ SAIE, 417.

後期，即便世界衛生組織認可了“零天花”的成功，組織內部同時也不斷強調“橫向的”健康干預，比類类似于 SEP 項目的“縱向”延伸更為重要。“縱向”項目指的是那些明確針對消滅某種健康問題的項目，而“橫向”則強調在適應於當地經濟、社會、文化因素的基礎上，在發展中國家建立更多防禦性、基礎性的健康服務設施。⁹¹對注重實幹的亨德森而言，“橫向”項目幾乎等同於僥倖心理。他曾說過，“縱向項目是一種有組織、可操作，且有質量保障的項目”，而“橫向項目”則“類似于一種正在努力工作的姿態”。⁹²但是其他國際健康機構的人員並不這樣看。他們批評縱向項目過於強調可量化的結果，並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系統化的醫療改革進程為代價。⁹³

國際健康組織中這樣的緊張局面，在 1978 年進一步激化。當時 SEP 項目就快成功收尾，而世界衛生組織的成員國則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府阿拉木圖舉行集會，慶祝世界衛生組織三十周年紀念。大會最終發表宣言，為世界衛生組織設定目標，將憲章中“健康”一詞定義為“身體，精神和社交方面完全健康的狀態，不單純指消滅某種疾病”。宣言並承諾，世界衛生組織“到 2000 年，要使每一個人達到健康狀態。”⁹⁴阿拉木圖宣言將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定義為關懷全人類的基本健康。它也被視為世界衛生組織著眼于橫向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這一目標包括“對潛在健康問題、預防疾病與控制疾病方面的教育；促進食物與營養供應；安全、衛生、充分的水資源供應；親子健康與生育控制；主要傳染性疾病的疫苗注射；對地方性傳染病的預防與控制；普通疾病和傷勢的恰當處理；以及基本藥物的供應。”⁹⁵對支持這些目標的人而言，成功消滅天花分散了組織的注意力，在鼓勵技術干預的同時，犧牲了宣言提及的以上更廣闊的目標。

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對 SEP 項目的態度左右為難，它還是從項目最初構想到後期執行的各個階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國際管理、合作的制度框架，使得醫療官員們得以將消滅天花視作全球問題，並尋求全球解決方案。在這方面，組織提供了理解、操作與執行的平臺。畢竟，對國際組織而言，國際健康首先意味著各項量化控制的條款。這些條款強調將疾病控制納入國家控制體系，採用防衛措施，鞏固邊疆不受病毒侵擾。它並不包括那些全球性的，需要各國聯合起來、在全球範圍尋求合作的健康問題。⁹⁶正是美國在 1965 年關於 ICY 的宣言，使得對此抱有同情的美國官員有了類似想法，並將這一想法第一時間呈給白宮，獲得了白宮方面的支持。不僅如此，冷戰雙方在這一項目中的合作，在世界衛生組織中立的組織框架與立場下，得以突破冷戰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鬥爭。如果說世界衛生組織時常為 SEP 項目製造困難，那麼另一方面，作為 SEP 項目意義深刻的合作平臺，它為高度現代、進步的話語營造空間，對於 SEP 的成功不可或缺。

⁹¹ Sung Lee, “WHO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Contest for Ideology,” in *Western Medicine as Contested Knowledge*, ed. Andrew Cunningham and Bridie Andrews (Manchester, UK, 1997), 24-45. “橫向”與“縱向”之爭市場被描述為“全盤”與“小範圍”道路之爭。

⁹² 亨德森向作者所述，Baltimore, Maryland, July 18, 2007.

⁹³ David A. Tejada de Rivero, “Alma-Ata Revisited,” *Perspectives in Health: The Magazine of the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8, no.2 (2003): 2-7.

⁹⁴ Socrates Litsios, “The Long and Difficult Road to Alma-Ata: A Personal Refl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2, no.4 (2002), 709-32.

⁹⁵ 阿拉木圖宣言全文，見 <http://www.WHO.int/hpr/NPH/docs/declaration-almaata.pdf>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獲得)

⁹⁶ Neville M. Goodman, *International Health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Work* (London, 1952), 40-65.

SEP 的故事很難符合傳統冷戰歷史的敘事模式。即便消滅天花的成果已為世界認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態勢仍在不斷升級：緩和破裂了，蘇聯入侵了阿富汗，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帶著強硬的反共姿態接任了總統之位。也許最有說服力的一點是，雖然蘇聯同美國與其他國家一起致力於在全球範圍消滅天花，它仍舊暗中繼續秘密研製天花病毒的生化武器。⁹⁷這樣前後矛盾的行為，另一方面，也使得在冷戰背景下理解 SEP 項目更為必要。天花在全球範圍的消滅，需要依靠南北半球及東西半球各政府、非國家角色、以及個人的共同努力。當我們嘗試將 SEP 與全球健康史納入更廣闊的冷戰史的敘事框架中時，我們不僅要面對各種觀念、分析與方法論方面的挑戰，還要質疑以往研究的基本分類與敘事結構，從而延伸敘事的邊界。它也要求我們在思考冷戰衝突的同時，反思是否存在兩個超級大國相互合作的可能性，繼而在南北互動的語境而非新殖民主義的框架下，思考抵抗與合作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當然，它也要求我們突破以國家為主體和範圍的歷史敘事，探索國際組織與非國家角色在全球領域扮演的角色。⁹⁸而另一方面，它也啟示我們，國家整體不應當再被視為國際歷史的主角。有必要超越國際關係中關於國家政策的敘事，把目光放到像 CDC 這樣一類很少在國際史研究中引起注意的角色上，這樣，才能更完整地把握那些既非外交政策、外交機構，也非任何國家構建起來的，原因與意義的歷史網絡。

將全球疾病控制寫入冷戰歷史是一項挑戰。它需要我們延展國際史寫作的主題範圍和敘事方法，在過去幾十年的豐碩的成果上做進一步推進。關於戰爭、安全、經濟方面的事件，同文化轉換、社會運動、以及思想觀念的國家影響一樣，都對國際史至關重要，未來也必將成為這一領域新的研究路徑。⁹⁹然而我們也需要深入、持續挖掘這些新方法和新角度以外的題目，如傳染病與公共健康，現代科學技術知識的滲透，全球語境下的環境問題，等等。¹⁰⁰這些題目都處在當今國際事務和全球化趨勢的話語中心。瘧疾，肺結核，HIV/AIDS，禽流感這樣的全球健康問題，已經吸引了比爾·蓋茨，安吉麗娜·朱莉等名人，政策設計者以及全球精英的目光，將來必定會有更多的歷史學家投入到這一領域的研究之中。對國際史的研究者而言，這是振奮人心的時代。

* 原文載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4, No. 2 (April 2010). . 2010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 Published by Wiley Periodicals, Inc., 350 Main Street, Malden, MA 02148, USA and 9600 Garsington Road, Oxford OX4 2DQ, UK.

⁹⁷ 關於蘇聯利用天花病毒為生化武器，見 Ken Alibek, *Biohazard: The Chilling True Story of the Largest Covert Biological Weapons Programs in the World, Told from the Inside by the Man WHO Ran It* (New York, 1999); Tucker, *Scourge*, esp. chap. 8.

⁹⁸ 入江昭倡導的研究路徑，見 Akira Iriye,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ed. Thomas Bender (Berkeley, CA, 2002), 47-62, 以及這一領域新近熱門討論的文章，C.A. Bayly, Sven Beckert, Matthew Connelly, Isabel Hofmeyr, Wendy Kozol, Patricia Seed, “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no. 5 (December 2006), 1441-64.

⁹⁹ 這些在 Brenda Gayle Plummer, “The Changing Face of Diplomatic History: A Literature Review”一文中有很好的介紹，見 *The History Teacher* 38, no. 3 (May 2005): 385-400

¹⁰⁰ 關於全球環境史，見麥克尼爾的作品。關於環境外交史，見 Kurkpatrick Dorsey, *The Dawn of Conservation Diplomacy: US-Canadian Wildlife Protection Treatie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Seattle, 1998). 然而就這一領域，還有許多可繼續深入探索的空間。